

# SEEING THE ELEPHANT

##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from Trunk to Ta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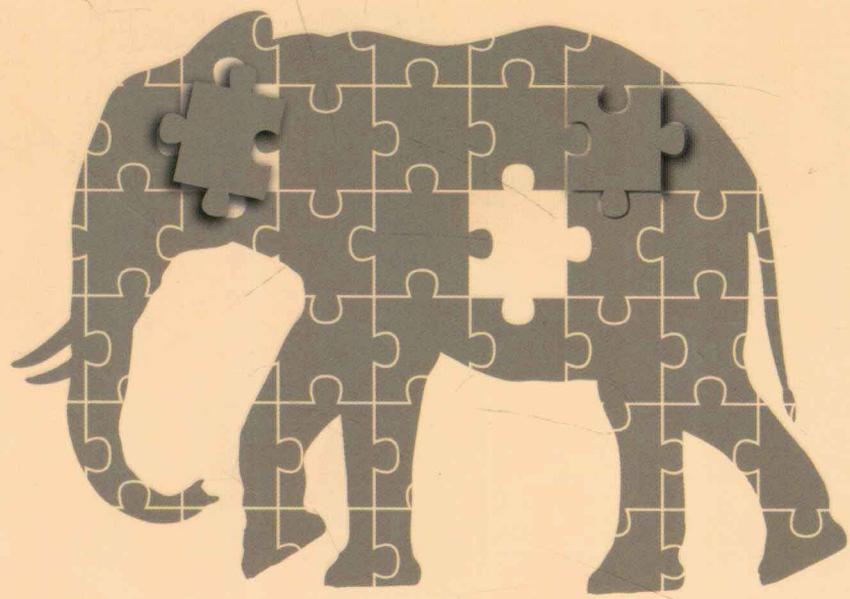


# 看大象

## 全面理解全球化

[美] 彼得·马尔伯 (Peter Marber) 著

潘奇凡 王媛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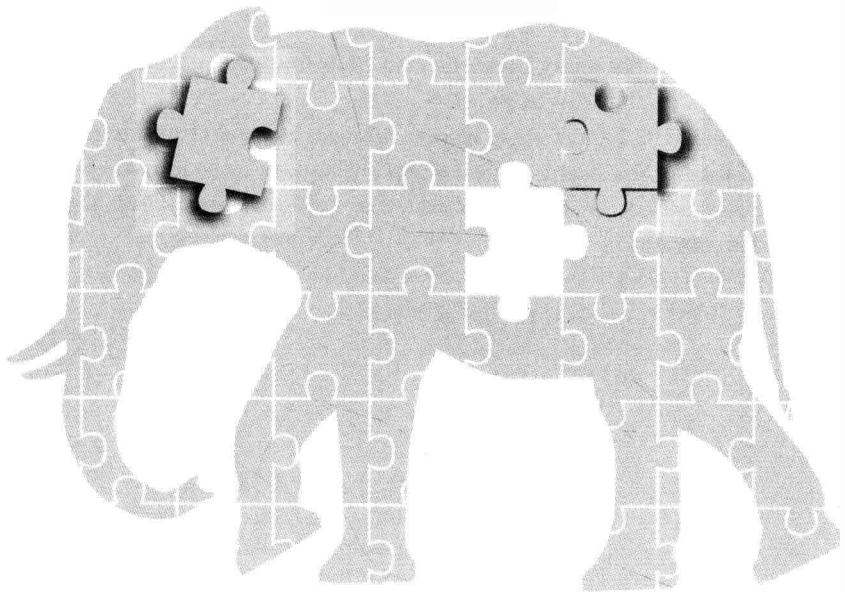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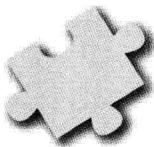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看大象

## 全面理解全球化

[美] 彼得·马尔伯 (Peter Marber) 著  
潘奇凡 王媛媛 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大象:全面理解全球化/(美)马尔伯(Marber, P.)著;潘奇凡,王媛媛译.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1

书名原文:Seeing the Elephant: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from Trunk to Tail  
ISBN 978 - 7 - 5095 - 4161 - 6

I. ①看… II. ①马… ②潘… ③王… III. ①全球化—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613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9 - 5604 号

责任编辑:刘占彬 封面设计:华乐功

版式设计:孙志云 责任校对:孙志敏

Peter Marber

**Seeing the Elephant: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from Trunk to Tail**

ISBN 978 - 0 - 470 - 28385 - 1

Copyright © 2009 by Peter Marber.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Hoboken, New Jersey.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John Wiley & Sons, Inc. 授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独家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l.cn>

E-mail: [win@ewinbook.com](mailto:win@ewin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发行电话:010-88190406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9.25 印张 30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4161 - 6/F · 338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看大象：全面理解全球化

---

## 致谢

多学科研究需要来自朋友们的大量支持，本书的写作也不例外。

首先，感谢我的经纪人威尔·利平科特（Will Lippincott）和玛丽亚·玛茜（Maria Massie），是他们鼓励我去勇敢地写作，还有来自出版商 John Wiley & Sons 的黛布拉·英格兰德（Debra Englander）、凯利·奥康纳（Kelly O'Connor）、凯文·霍尔姆，是他们推动并激励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和同事们总是能够给我带来灵感，刺激我的思维。没有他们的专业知识和鼓励，本书的许多主题将永远无法展现在读者眼前。丽莎·安德森（Lisa Anderson）、杰狄士·巴格瓦蒂（Jagdish Baghwati）、迪克·贝茨（Dick Betts）、约翰·科特斯沃斯（John Coatesworth）、罗伯·加里斯（Rob Garris）〔还有全球公共政策网（Global Public Policy Network）的很多朋友〕以及梅里特·简诺（Merit Janow）、约瑟·安东尼奥·奥坎普（Jose Antonio Ocampo）、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等人为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以及很多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我还非常感谢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他为我解答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自 1991 年以来，哥伦比亚大学还为我提供了多名实习生，他们中的很多人本书付出了辛劳和想法。阿美利亚·艾尔韦特（Amelia Erwitt）、卡米尔·卡鲁扎（Kamil Kaluza）、戴比·朗德瑞斯（Debbie Landres）和纳迪亚·萨特亚穆西（Nadiya Satyamurthy）协助我构思了本书的基础，以及我以前写过的相关文章。我们特别感谢下面这些“天使”——普里西拉·亚当斯（Priscilla Adams）、格罗里亚·哈特纳（Gloria Hartner）、苏菲·迈尔斯（Sophy Miles）、南希·费兰特（Nancy Ferrante）和吉姆·麦金尼（Kim McGinnis），特别是吉姆·麦金尼，她一直充满热情地

和我一起工作，直到本书完成，而且她凭借敏锐的观察和天生的语感，对每一页的内容都进行了润色。

我欠下了许多知识债。来自世界政策研究所（World Policy Institute）的朋友们帮助我构思了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关键论点。伊安·卡斯伯森（Ian Cuthbertson）、米拉·卡姆达（Mira Kamdar）、卡尔·迈耶〔Karl Meyer，以及他的妻子莎伦·布莱尔·布里萨克（Shareen Blair Brysac）〕、本·鲍克（Ben Pauker）、史蒂夫·施勒辛格（Steve Schlesinger）、施莱·施温尼格（Sherle Schwenninger）、约翰·瓦茨（John Watts）、琳达·瑞格莱（Linda Wrigley）和迈克尔·武克（Michelle Wucker）都对本书提供了自己的观点。我要感谢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泰德·霍尔斯特德（Ted Halstead），他不仅将我介绍给一群了解宏观问题的人们，而且他自己关于政策的观点对我的见解也有很大影响。新美国基金会的其他朋友——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莎伦·布朗利（Sharon Brownlee）、史蒂夫·柯尔（Steve Coll）、弗兰克·福山（Frank Fukuyama）、雅各·哈克（Jacob Hacker）、扎克·卡拉贝尔（Zach Karabell）、普拉格·可汗那（Parag Khanna）、杰弗瑞·刘易斯（Jeffrey Lewis）、约翰·那格尔（John Nagl）、雷切尔·怀特（Rachel White）、丹·叶尔金（Dan Yergin）——都为本书提供了卓越的见解。

本书的许多概念来自于同其他作者和学者多年来的数十次谈话，我无法一一说出他们的姓名。但是，在此我要提到其中几位：山姆·布里坦（Sam Brittan）、保罗·布鲁斯坦（Paul Blustein）、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史蒂芬·大卫（Steven David）、彼得·菲沃（Peter Feaver）、杰夫·加滕（Jeff Garten）、理查德·戈德伯格（Richard Goldberg）、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克雷格·卡明（Craig Karmin）、艾德·林肯（Ed Lincoln）、约翰·缪勒（John Mueller）、阿米蒂·施莱斯（Amity Schlaes）、吉姆·特威切尔（Jim Twitchell）和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我要特别感谢比尔·克林顿总统，他在繁忙的日程安排中抽时间向我提供了他关于一些问题的看法。

HSBC的同事们给予我极大的鼓励。首先，HSBC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我能够亲身见证我在本书中描述的大趋势，实际上，每天的全球性工作和投资等实践经验是我接受过的最好的教育。我要特别感谢马库斯·阿克

曼 (Markus Ackermann)、鲁道夫·阿潘布林克 (Rudolf Apenbrinck)、斯坦·安卡克罗纳 (Sten Ankarcrona)、尼格尔·布朗 (Nigel Brown)、戚浩霖 (Chris Cheetham)、丽莎·金 (Lisa Chin)、保罗·道 (Paul Dawe)、克里斯蒂安·迪瑟格里斯 (Christian Deseglise)、麦克·加里亚迪 (Mike Gagliardi)、史蒂夫·吉本 (Steve Gibbon)、萨拉·格里洛 (Sara Grillo)、克莱尔·哈蒙德 (Clair Hammond)、卡特·哈利 (Kat Harley)、阿里夫·乔什 (Arif Joshi)、埃利卡·迈索尼特 (Erica Maisonet)、马克·迈库姆 (Mark McCombe)、比尔·迈克肯齐 (Bill McKinzie)、艾梅·米豪科 (Aimee Mihalko)、克里斯·米罗诺波罗斯 (Chris Milonopoulos)、瑞卡·拉姆达斯 (Rekha Ramdas)、查斯·罗宾逊 (Chas Robinson)、珍·卢克·罗格 (Jean Luc Roghe)、保罗·希瑞 (Paul Seary)、丹尼斯·西蒙 (Denise Simon)、珍妮·孙 (Jeanie Sun)、尼克·汀布莱克 (Nick Timberlake)、乔治·瓦里诺 (George Varino) 和海纳·韦伯 (Heiner Weber)，他们为本书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每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会回想起我从前的老师们。已故休·肯纳 (Hugh Kenner) 总是为我提供最多的灵感，我可以很轻松地同他谈论所有的事情，从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到计算机再到卡通片。我要把本书献给他。在通过书稿表达我的想法时，过去同米尔顿·卡明斯 (Milton Cummings)、帕斯夸里·德维托 (Pasquale DeVito)、南希·梅尔瑟 (Nancy Mels-er)、罗恩·保尔森 (Ron Paulson)、彼得·萨克斯 (Peter Sachs)、弗里米·萨根 (Frimi Sagan) 和拉泽尔·齐夫 (Larzer Ziff) 的谈话内容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妻子安德丽亚 (Andrea) 和我的两个女儿。从大学期间开始，安德丽亚就是我最好的搭档，在本书写作的每一个环节，她都进行了可靠的审核。

# 目录

## 导言

- 0.1 通过不同的透镜看世界 / 2
- 0.2 量子世界与新的参与者 / 5
- 0.3 面临危险的资本主义和平 / 8

## 第1章 21世纪全球化大观

- 1.1 老的又变成了新的 / 13
- 1.2 战后时期：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失衡的全球经济 / 15
- 1.3 新兴的多极化力量 / 18
- 1.4 E7 与其他新兴国家 / 20
- 1.5 非国家参与者的兴起 / 22
- 1.6 迈向资本主义和平 / 24
- 1.7 误解的时刻 / 26
- 1.8 新的金融竞技场 / 28
- 1.9 反作用：全球化将带我们走向何方？ / 32
- 1.10 利益趋同还是趋异？ / 36
- 1.11 新千年的“量子架构” / 37
- 1.12 美国的最新挑战与新全球日程表 / 43

## 第2章 贸易与金融：金钱无处不在

- 2.1 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皈依新的信仰 / 49

- 2.2 贸易的下一个阶段 / 51
- 2.3 先进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贸易的助推器 / 54
- 2.4 越多越好：前所未有的相互作用 / 55
- 2.5 世界舞台上的非国家参与者 / 58
- 2.6 资本的可获得性与货币浪潮 / 62
- 2.7 金融中心的改变 / 64
- 2.8 不寻常的新市场 / 66
- 2.9 “宏观量子”危机剖析 / 70
- 2.10 美元的未来 / 75
- 2.11 资本主义和平的反作用？ / 80
- 2.12 制度变革：另一条量子之路 / 81
- 2.13 G7 的演变 / 82
- 2.14 WTO 与贸易的进步 / 83
- 2.15 世界银行的变革 / 86

### 第3章 能源——碳氢化合物的黄昏？

- 3.1 持续增加的需求 / 92
- 3.2 全球能源的地理学与数学 / 96
- 3.3 能源平衡与资本主义和平 / 102
- 3.4 能源供给现状 / 104
- 3.5 能源与全球金融体系 / 105
- 3.6 集中与不稳定性 / 111
- 3.7 大转变：从碳氢化合物到可再生能源 / 114
- 3.8 不再浪费，不再索取 / 117
- 3.9 真正的好主意：太阳能 / 120
- 3.10 领导潮流还是拖后腿 / 123

### 第4章 防卫与安全：防止战火重燃，避免末日之战

- 4.1 老世界，旧方法 / 129
- 4.2 武器的扩散 / 130

- 4.3 持续的内战 / 134
- 4.4 恐怖主义 / 136
- 4.5 新的世界与多元化战略 / 138
- 4.6 重整美国在本土及海外的武装力量 / 139
- 4.7 改革美国的情报与外交部门 / 145
- 4.8 新的安全框架 / 149
- 4.9 “无序”新世界中的联合国 / 150
- 4.10 北约的改革 / 158
- 4.11 未来之路 / 161

## 第5章 移民：任何地方都有人的足迹

- 5.1 滴答作响的年龄炸弹 / 166
- 5.2 新的财富，新的目的地国家 / 170
- 5.3 趋势及其对美国和 G7 国家的影响 / 172
- 5.4 移民：内在关联与挑战 / 176
- 5.5 移民、贸易和可怕的“外包” / 178
- 5.6 移民与安全 / 182
- 5.7 移民与医疗保健 / 186
- 5.8 移民政策 / 188

## 第6章 注重明天的健康而不是为昨天的疾病买单

- 6.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 199
- 6.2 医疗保健提供者与保险 / 202
- 6.3 医疗旅游 / 204
- 6.4 国际健康基础设施 / 205
- 6.5 假药 / 207
- 6.6 健康及相关问题 / 209
- 6.7 处方：仅有创可贴是不够的 / 212

## 第7章 环境——隐藏的成本

- 7.1 繁荣：是问题还是解决方案？ / 220

- 7.2 陆地 / 224
- 7.3 水资源 / 233
- 7.4 空气 / 238
- 7.5 培养环保意识 / 243

## 第8章 贫困——记住金字塔的底层

- 8.1 贫困的趋势：一些亮点 / 253
- 8.2 贫困的相互联系 / 257
- 8.3 外国援助和新千年发展目标 / 263
- 8.4 对抗贫困的战略 / 266
- 8.5 减轻贫困：宏观量子世界的一种战略 / 274

## 第9章 宏观量子世界前行的新方向

- 9.1 衰败但不衰落 / 277
- 9.2 生活在数字中 / 280
- 9.3 购买力平价 / 285
- 9.4 人口增长和人均GDP / 286
- 9.5 通过举债实现的“增长” / 288
- 9.6 宏观量子世界中的进步 / 290
- 9.7 对消费、债务和储蓄的再思考 / 293
- 9.8 多极世界中的协作 / 296

---

## 导言

今天，将全球化——通过贸易、投资、技术、思想和移民构建的复杂的生命之网（web of life）——作为主题进行写作的人都要感谢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和阿尔·戈尔（Al Gore）。不管你是否赞同他们杞人忧天式的预言，但《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和《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前美国副总统戈尔主演的一部有关气候变迁的纪录片，其中特别关注全球变暖现象——译者注）在20世纪90年代末激动人心的“反对一切”（anti-everything）的抗议中起到了教育和鼓舞大众的作用。

弗里德曼和戈尔的畅销书以及其他几位优秀学者的著作讨论了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些方面。就像寓言“盲人摸象”中的盲人只能感觉和描述象牙、象耳、象鼻而不能从整体上充分了解大象一样，这些作者都倾向于针对全球化的一两个特征发表评论，很少有人会尝试描述所有的现象并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全部联系。因此，尽管《世界是平的》（还有弗里德曼的其他作品）生动地描述了全球经济竞争，而《难以忽视的真相》则通过不断加速的环境恶化令我们感到震惊，但这些话题都需要与21世纪地球上许多其他要素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因为在我们这颗星球上，生活着67亿人，他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生产和消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全面地看到全球化相互关联、相互重叠、相互冲突的各个方面，并开始制定将这些快速变化与相互联系考虑在内的国内及国际政策。

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如果没有仔细考察全球贸易、金融、能源、移民、环境和国防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谈论我们关心的基本问题，如抵押借款、退休计划和天然气价格等。但是，作为美国的公民，我们似乎

并看不到 21 世纪的文明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联系在一起。同样，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权力格局（power structure），我们选举出的那些官员在制定重大政策时也显得笨手笨脚。如果不能识别、承认并理解这些联系，我们甚至不能开始讨论美国及其他国家如何在这一激动人心的进步过程中精心设计并利用有效的策略。

## 0.1 通过不同的透镜看世界

美国人无法融入到全球化的混乱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都生活在一个容易理解的世界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但相对孤立且面向国内，其贸易占全部经济活动的比例还不到 10%。美国在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再加上美元的强势和石油价格的低廉——使得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超越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生活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宰着世界，过着奢侈的生活——事实的确如此。汽车越来越长、越来越重，人们的身材越来越高、越来越胖，住宅越来越大，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也越来越显著。由于美国的市场巨大，因此许多外向型国家很自然地希望与美国人做生意，并努力赶上美国富裕的生活方式——穿高档、时尚的服装，开又大又豪华的汽车，听流行音乐，欣赏电视和电影，吃过的东西。美国被看成是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尽管有一点儿粗鲁（gauche），但头脑和心肠还是好的。

在 20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挑战。那时，欧洲和日本正在重建，前苏联、中国、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量非常低，而且与美国相比，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也小得多。实际上，在几十年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美国相匹敌。在外交政策方面，通过将一些国家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核保护伞之下以对抗传说中的苏联威胁，美国在 1945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间维持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美国在海外建立了军事基地，在很多国家驻扎了军队，布置了武器。在简单的两极世界中，华盛顿维持着一种简单但有效的全球战略：保护那些与我们做生意的国家。但是，后冷战时代需要

一种更宽泛、更复杂的观点。

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体，但与一代人之前相比，美国要在很多产业中同许多国家进行竞争。全球贸易——超过 20 世纪 50 年代的成百上千倍——成为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类活动。数以百万吨计的自然资源被极其高效率地提炼、开采出来，并在许多国家之间转运；世界上数百万家工厂生产出无数的高科技和低科技的产品；密集的运输网络通过海、陆、空将这些资源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送，把它们运送到从前只能通过香料和古诗歌了解的市场中。整个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自由开放的、狂热的全球性贸易称为一个“系统”的话）在大量的金融玩家和市场支持下运作，它们将储蓄者、投资者、生产商、工人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数以万亿计的货币以电子方式不间断地在全世界循环。不断加速的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了贫困，数以亿计的人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更高，比从前更有希望。

如果世界继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发展，并使剩下的穷人摆脱贫困，那么我们就必须开始认识到构成混乱的新千年的各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联系——在这个新千年中，各个国家明显是相互独立的，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全球体系之中。伴随着混乱的跨界活动而来的是需要我们充分评估和防护的新风险与新威胁——如恐怖主义、多样化的人口统计学特征（diverging demographics）、资源短缺、金融失衡、环境压力。想一想 2007 年开始动摇美国银行体系的大地震是如何通过金融市场和各个经济体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

实际上，在 21 世纪，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透镜来观察世界。为了生存和繁荣，我们需要改变“思想背后的思想”（thinking behind our thinking）。几十年来，美国和它的一些盟友采用了一种线性的、区隔化的方法（compartmentalized approach）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微观国内”（Micro Domestic）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下，政策是支离破碎的，是分别制定的。结果，美国在“我们能够（也许确实能够）控制全球的变化”这一信念之下调整其政策。但是，在战后时期，世界并不是相互隔离的，各国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超越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为了继续顺利前进，为了继续繁荣，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一种“宏观量子”（Macro Quantum）范式。

与战后老式思维方式相比，“宏观量子”观点认为：权力是流动的，而不

是固定的；未来的事件并非完全可以预测；而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所谓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虚幻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美国片面的观点应该逐渐发展成多种可能性之一。我们应该承认并重视环境的改变，简单（simplicity）应该被复杂（complexity）所代替，确定性（certainty）应该被模糊性（ambiguity）所代替，一致性应该被多元化所代替。这样一种全面的观点强调有机的、自由的相互作用与共同决策，而不是恪守区隔化的、自我决定的死板信念。在“宏观量子”世界中，我们必须明白，权力的流动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实际上，试图对其进行控制——如我们在伊拉克看到的——很可能达不到目的，甚至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的确，这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概念。生活变得越复杂，人们就越希望得到简单的答案。但是，以后不会再有简单的答案了。20世纪中期少数高效的、自主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体现在要应对错综复杂的、紧密联系的贸易与投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存在着数十亿的工人和消费者，他们必然会受到日益复杂且交织在一起的安全、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影响。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微小变化可能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斯蒂芬·利维特（Steven Levitt）可能会称之为“魔鬼经济学”式的世界。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得到非黑即白的答案，但21世纪是一个充满着灰色阴影的时代。

美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以及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商业与金融模式。面对这些变化，美国政府的许多政策在新千年中都显得非常幼稚。最近的10年间，美国政府——大概是对“9·11恐怖袭击”的一种自然反应——一直受到无知的压力（strain of ignorance）、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和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影响，而不是去鼓励有见地的讨论并开发新方法。批评家们认为，布什政府在很多议题上——从全球变暖、政府支出到入侵伊拉克——不加掩饰地舍弃硬数据（hard data）和专家意见就是一个例证。许多人（包括笔者）都认为，在最近10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传统的政策沟通渠道（包括认真分析和争论）已经被鲁莽的、基于信念的、直觉层面的决策所取代。理性的公开讨论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政治家和媒体之间乱哄哄的、盲目的吵闹所代替。虽然布什政府的政策和特性（personalities）肯定已经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财富造成了损害，但全球化在新保守派闯入华盛顿之前早已开始了。全球化的势头已经积蓄了几十年，其飞快发展的步伐使得最近那

些孤立的、教条的政策看起来毫无意义。就连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的区别也有些模糊了。

为什么我们无法把握当今的复杂性？美国人一直抵制对政策的争论，但每次当我们最需要严肃讨论的时候，我们似乎对这些讨论更加不信任。我们的学生在科学和数学上落后了不止一代人，主要是因为从根本上忽视了基本的公民观念（civic concept）。参加全民投票的美国人还不到一半，市民中只有 1/6 的人持有合法护照（而每 3 个人中只有 1 个人参加行政官员的选举），2/3 的人说不出政府 3 个部门的名称或 1 位最高法院法官的名字。尽管我们的国家患上了注意力缺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但以党派的意见和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卢·多布斯（Lou Dobbs）、比尔·马赫（Bill Maher）以及史蒂夫·科尔伯特（Steve Colbert）的滑稽剧来代替严肃的政策对话，这是不是令人感到吃惊呢？

这只不过是 2008 年总统候选人忽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全球事件具有模糊但紧密的联系）而向我们灌输各党派关于金融危机与伊拉克问题的声明（偶尔还会涉及与堕胎、同性婚姻、干细胞研究、宗教、枪支控制和死刑相关的道德问题）的部分原因。在 2007 ~ 2008 年经济回落期间，我们听到了一些对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主要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言辞。几乎没有候选人谈论最迫切的问题：在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美国及其历史上的同盟者出现了相对的衰退。随着抵押借款问题不断加剧，总统候选人们仍然回避“我们面临的经济困境在本质上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难题”这一问题：美国的次级借款危机（subprime crisis）实际上是范围更大的全球性信用危机（credit meltdown）的一部分。我们能指望的就是奥巴马总统在新的全球经济现实中，敢于承担起领导美国——也许是整个世界——的责任。这将需要对政策进行重大转变，包括对战后建立的多边机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进行大幅调整，并且/或者建立新的机构，以协调这个不再由西方基督教白人社会主宰的世界中的跨国问题。

## 0.2 量子世界与新的参与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重大进步都是由美国连同欧洲和其他盟友

组成的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G7，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推动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一些为世界共同进步以及冲突解决制定规则、行为标准和机制的国际会议中，这些国家充当着核心角色。但今天，G7 国家也出现了利益分歧和不同的意见，再加上非国家参与者（nonstate actor，NSA）以及强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G7 在全球的重要性受到了削弱。在很多方面，G7 国家已经丧失了使它们在上个世纪控制世界进程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但能够填补这一真空的恰当替代者还没有出现。

在新的千年中，许多曾经的“发展中”国家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已经超过了 G7 中较小的成员。像俄罗斯之类的大国以及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非洲国家（如埃及、尼日利亚和南非）中的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其受过良好教育、有竞争力的劳动力队伍也在不断成长。许多以前的穷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产出，并成为金融市场的积极参与者。通过对其经济进行高效的管理，许多以前的债务国现在已经变成了美国及其他 G7 成员（这些国家的经济依赖预算赤字和高杠杆）的债权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国家的金融地位得到了强化，它们占全球贸易和收入的份额急剧上升。

20 世纪的跨国活动主要由政府主导，而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间参与者（civilian player）——政治家们喜欢称之为“非国家参与者”——它们承担着以前由国家统治者承担的角色。银行、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MNC）、共同基金与对冲基金、新闻记者、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甚至恐怖分子和准军事组织，都拥有跨越国界的能力，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新的参与者通过以下方式推动着“宏观量子”世界的不断发展：它们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为政府融资和投资；它们提供教育、医疗和人道主义服务；它们传播并塑造公众的意见；它们影响政府最高层的决策；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会制造军事冲突。

我们的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在历史上，这些国家的跨国活动非常有限，因此没有什么联系，那么我们现在要如何应对突然而至的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到 2020 年，这个星球上将增加 10 亿人，我们如何防止出现潜在的资源失衡、短缺和“环境自杀”（environmental suicide）？是不是只有市场才能支配跨国